

許燄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四編 第十四冊

《四聲等子》音系蠡測

竺家寧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 編

許 燦 輝 主 編

第 14 冊

《四聲等子》音系蠡測

竺 家 寧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四聲等子》音系蠡測／竺家寧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142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編；第 14 冊）

ISBN：978-986-322-223-1（精裝）

1. 漢語 2. 聲韻學

802.08

102002768

ISBN-978-986-322-223-1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四 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322-223-1

《四聲等子》音系蠡測

作 者 竺家寧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四編 14 冊（精裝）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四聲等子》音系蠡測

竺家寧 著

作者簡介

竺家寧，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曾任韓國檀國大學 (Dankook University, Korea) 客座教授、巴黎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訪問學者，維也納大學漢學系客座教授，中正大學中文系主任暨中文所所長、美國 IACL 理事 (member of Executive Boar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05-2007, U.S.A.)。韓國「國語教育學會」(국어교육학회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Society) 2007 聘為「海外學術委員」。著有《四聲等子音系蠡測》等專書二十多部。所著《古今韻會舉要的語音系統》一書，日本駒澤大學譯為日文本發行。前後在國外及大陸講學 60 多次。包含美國伊利諾大學、捷克布拉格查里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2004 年獲選入「中國語言學會」評選之《中國現代語言學家傳略》。曾主講聲韻學、訓詁學、語音學、漢語語言學、詞彙學、漢語語法、佛經語言、語言風格學等課程。已故之國學大師嚴學窘先生曾撰文稱道竺家寧的古音構擬，建立了嚴格的構擬原則。並稱道竺家寧是「著述最豐的音韻學家」。

現任其他學術職務：

中華民國聲韻學會常務監事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監事 World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國際中國語言學會會員 (美國 IAC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國際華語教學學會會員 (美國 CLT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提 要

等韻圖之產生約在唐代中葉，今傳最早之等韻圖為南宋紹興年間張麟之刊行之《韻鏡》及鄭樵通志中之《七音略》，其底本均出自唐人。早期韻圖以韻書之音讀為據，故可作為擬構切韻音之主要材料。

宋元間，為適合實際語音之趨於簡化，且通韻併韻之風氣日盛，因而等韻表亦改變其面目，由原有之四十三轉併為十六攝。其中以《四聲等子》為最早。另有僞託司馬光作之《切韻指掌圖》、元劉鑑之《經史正音均韻指南》。

《四聲等子》屬北宋之音韻圖表，其音韻系統既有異於切韻音，復與官話音不同，實為上承切韻音，下開官話音，承先啓後之樞紐。由此材料可考見中古韻母發生如何之省併，早期官話之系統如何逐漸形成。故《四聲等子》之研究自有其重要性在焉。

本論文的内容分為下列幾個部分。第一章：《四聲等子》研究，論述《四聲等子》之時代與作者、《四聲等子》之編排與內容、編排概況、《四聲等子》之內容、三、四等之混淆、輕重開合之問題、《四聲等子》之門法。第二章：《四聲等子》之語音系統，論述《四聲等子》聲母研究、《四聲等子》韻母音值擬測、《四聲等子》聲調研究。第三章：歷史之演變，論述從《切韻》至《四聲等子》、《四聲等子》與早期官話之關係。

本論文的撰寫完成，時間在 1972 年，目前由花木蘭文化出版社結集出版學位論文叢書，為了保存論文寫作當時的原始面目，雖然時隔四十年，沒有加以更動，這樣比較能夠看出當時思維的脈絡。



目

次

第一章 《四聲等子》研究	1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四聲等子》之時代與作者	5
第三節 《四聲等子》之編排與內容	9
壹、編排概況	9
貳、《四聲等子》之內容	12
參、三、四等之混淆	13
肆、輕重開合之問題	16
第四節 《四聲等子》之門法	18
第二章 《四聲等子》之語音系統	45
第一節 《四聲等子》聲母研究	45
第二節 《四聲等子》韻母音值擬測	58
壹、果攝擬音	59
貳、蟹攝擬音	66
參、效攝擬音	73
肆、山攝擬音	76
伍、宕攝擬音	82
陸、咸攝擬音	88
柒、止攝擬音	91
捌、流攝擬音	94
玖、臻攝擬音	97
拾、曾攝擬音	100
拾壹、深攝擬音	105
拾貳、遇攝擬音	106
拾參、通攝擬音	108
第三節 《四聲等子》聲調研究	110
第三章 歷史之演變	123
第一節 從《切韻》至《四聲等子》	123
第二節 《四聲等子》與早期官話之關係	132
參考書目	141

第一章 《四聲等子》研究

第一節 前言

人類語言之產生極其久遠，最初之語言，其真實狀況若何，已無可考索。而語言之研究乃了解人類一切活動之基礎，不明古人之語言，則無由探知其思想、行爲及文化狀況。然語言之變化極速，生物之演化常以千萬年計，地質之演化更以億萬年計，而語音之演化非但於百年間可見其端緒，即某人一生中，其早年、晚年之語音亦絕不能一致。語言乃社會之習慣，習慣不適用於生活之需要，則必生變化。某人之語言亦常受社會環境之支配，如易地而處，語言習慣亦必隨之改變。由個人語言（*idelect*）之差異，代代累積，由音值之別而變爲音位系統之增減，語言乃發生分歧，方言（*dialect*）由是而生。時代久遠，語言之分歧更爲深遠，乃產生語系（*language group*）之分。今日之美、英、德、法、俄諸國，其語言雖互不相同，而其來源則同爲印歐語族（*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所以有今日之差異，即因時代久遠、地域殊隔之故。欲推尋古今語言變動之情況，即歷史語言學之範圍。

漢藏語族（*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分佈於亞洲東部，而以漢語爲主，欲明原始漢藏語之真象及其演化，必自中國聲韻學始。故聲韻學之效用，除有助於閱讀古籍之外，而研究語言亦其一大目的。

傳統之聲韻、訓詁之學較偏重於字音、字義之研究，故難免因文字之束縛

而掩蓋語言之真象；例如「輾轉」本爲一詞，而云「輾有轉之半，轉者輾之周」；「窈窕」本爲一詞，而云「美心爲窈，美色爲窕」；「狼狽」、「猶豫」亦皆一詞，而分別以動物之習性附會之。此皆受一字必具一義之觀念所影響，誤以一字即相等於語言之最小單位，而未認清文字於語言應用時所具之功能。

陳師伯元云：「古人既音在字先，造字赴音，則同一語根，自可滋生多字。」並舉具有「橫暴強梁」一義之詞如下：「畔援」、「畔換」、「跋扈」、「泮奐」、「叛換」、「伴換」、「暴橫」等；又舉具有「滯留不前」一義之詞如下：「踟躕」、「躊躇」、「跼蹐」、「躊躇」、「躊躇」等。凡此之類皆應語言而生，非能於個別字義中求其訓釋也。然則，文字與語言之關係研究爲如何？

人類語言之使用當遠在數十萬年前，而文字之萌芽不過數千年之事。最初之文字由描繪具體形象構成，近世出土之甲古文，其時代在公元前十四至十二世紀間，圖畫之規模歷歷可睹，然其書寫形式已漸趨一致，並具固定之音讀，與語言合流，成爲表示語言之工具。其後雖歷經形體之變革，而代表語言之特性，均永遠存在。

或云泰西之拼音文字方爲描寫語言之文字，漢字在於衍形，早已獨成系統，與語言分途而行。固然，若就漢字之構成言，可謂之形符文字，而漢字之用，則早已成爲聲符，所異者僅爲泰西文字在於記錄音位，漢字則以音節 (syllable) 爲單位。

無論古籍中、口語中，既經書爲文句，文字之作用幾已成爲一群音節符號 (Syllable Symbol)，而少有涉及本義者。例如「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句，說文之本義如下：「子」爲「萬物滋生」，「學」爲「覺悟也」，「而」爲「面毛」，「習」爲「數飛也」，「之」爲「出也」，「不」爲「鳥飛上翔」，「亦」爲「手臂兩腋」；如皆以造字之本義釋之，勢必窒碍不通，無法窺知全句之義。蓋漢字之初雖未必配合語言而造，漢字之孳乳及運用，必無法去語言而獨存也。有數字皆屬同義者，此也；有一字而數義者，此也；有數字皆同音者，此也；有一字而數音者，亦此也。

文字之發展雖無法脫離語言之支配，而文字究非語言，吾人不可因漢字爲一字一音節，遂認漢語爲單音節語 (Mono-Syllabic)。研究某語言之語音，觀念上，當先撇開文字之束縛，而直接就語言文句之構成層次作一分析，以具有意義之最小單位爲基礎。以詩經首章爲例，「關關」、「雉鳴」、「窈窕」三詞雖各以

二字代表，卻為語義之最小單位，無法再加分析，如以拼音文字表示，各詞均僅一字耳。今見其具二字，實因其字屬複音節，而漢字皆單音，故不得不以二字表示一字之義。又「淑女」、「君子」二詞雖由合義方式構成，既經結合，應用上即成為表義之最小單位，諸如此類情況皆應列入漢語音韻之研究範圍。或云，此已牽涉於構詞學，與音韻無關，其說非也。構詞學（Morphology）本為印歐語族之語言學家為其語言所設，如英、法諸語言，其一字常因時態、語氣、性別、數目而有形態變換，其變換在在皆與詞性、語法地位產生密切關係，故構詞學常視為文法之一部分，或成立獨立之構詞學研究之。漢語構詞學之內容並無印歐語豐富，各字既無形態變換，其詞性又可由句中之位置顯示，同時，由於衍聲複詞及同語根詞之大量存在，使漢語之構詞實即構字，故與文法無關，而與語音之關係密切，實應納之於聲韻學之範圍也。

試觀「帝國主義」一詞，吾人能謂之四「字」耶？如此則英語之 Imperialism 亦當為兩字矣（Imperial+ism），則「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之會意字亦當為二字矣；吾人平日所稱之「字」，其包含之概念極為模糊，作語言分析時，所指為 Character（方塊字）耶？為 Word（詞）耶？為 Morpheme（詞素）耶？此乃傳統治小學所未及見也。吾人所以習慣認「帝國主義」為四字，而以「武」為一字，實受大前提「凡表義之最小單位必為一音節」之推論而得，若如前論，漢語並非全屬單音節語，則「帝國主義」與「武」何殊？其皆屬於具有單一概念之詞（Word），僅音節多寡有別耳。

理論上，語音史上之擬構（Reconstruction）不應脫離意義而存在，語言之本質，音義相伴而生，有音必有義，故印歐語之歷史重建，擬音亦必擬義，如放棄意義而言擬音，所擬僅為一空泛之軀殼，至多只能知古代大致之音位系統而已，就語言研究之立場言，難免於支離破碎。漢字所表現者，僅為抽象之音節，吾人無法由此音節得知其在語言中所具有之實質意義，其與意義之單位並不一致，故據文字論斷語音，終不能窺得古語之全貌。

然而，實際上，漢字究非拼音文字，古代音值無法留存，漢語史之工作又不能不以字音（character）之研究為基礎，透過方塊字以考訂各時代之音位系統。更重要者，進而與構詞學、語法學、訓詁學相結合，作全盤科學化之歸納、整理與研究。如此漢語史方能建立體系，聲韻之學亦不致流於空泛矣。

近代之多音節詞有增無減，甚且數倍於往昔，例如「火車」、「吞併」、「漂

亮」、「糊塗」、「原子彈」、「帝國主義」等皆是。其原因爲：

(一) 語言之變化大都由綜合語 (synthetical language) 進而爲分析語 (analytical language)，古代一字中常包含較複雜之概念，如「牯」爲白黑相間之雜毛牛、「棹」爲山產之梨。近代則常以修飾語置於共名之上，以限制共名之內容，故形成多音節詞。此種發展既可限制字數之增加，亦因意義上包含之數種概念已分析爲數個獨立之語詞，而使語言不致含混，拉丁語即爲綜合語之代表，英語正由綜合而趨向分析，現代漢語則已成爲極端之分析語，故音節結構不能不由單而複也。

(二) 古漢語之音韻系統極爲複雜，《切韻》音之聲類達四十以上，韻母依董同龢氏所擬，計前元音有【i】、【e】、【ε】、【æ】、【a】五類，中元音有【ə】、【v】、【A】三類，後元音有【u】、【o】、【ɔ】、【ɑ】四類；而現代國語聲母僅二十一，韻母除舌尖音【i̯】外，計前元音有【i】、【e】、【a】三類，中元音無，後元音有【u】、【o】、【y】三類，韻母與《切韻》爲六與十二之比，因此之故，古代原有分別之音節，今已混而爲一，同音字即增多，以單音節表達語義之功能勢必降低，故不能不趨向複音發展也。

多音節語雖日漸增多，而古來恆以一漢字表一音節，絕不因語言中有「xutu」一義，而造成一字代表之，仍以「糊塗」二字 (character) 表示，其所取者，無關於「糊」、「塗」原有之字義，純以音節符號視之。故漢字 (character) 所擔負之語言功能有時爲一詞 (word)，如「我」、「紅」、「走」諸字；有時爲一詞素 (morpheme)，如「飛機」之「飛」與「機」、「國家」之「國」與「家」等；有時二字乃成一詞位，如「逍遙」、「絡繹」、「老師」等；有時一方塊字而包含二詞位，如「甬」、「歪」等。因此，以方塊字爲對象而研究古音，僅能得知一音節中之結構如何，並推尋某一時代之聲韻母系統，而無法得知其構成意義單位後之音韻結構及分配如何。亦即漢字者，乃分裂語音爲個別之音節而成之單位，由此個別之音節，無法得知其實際之語言功能，僅能就此音節加以分析，由歷代不同之材料中以考知其聲、韻母之大概變遷，與印歐系語言之能直接自拼音文字中得知古語之全盤現象者不同，就此而言，未嘗非方塊字之短也。

所謂等韻圖者，爲橫列聲母，縱分四等與四聲，將各字依其音讀填入適當之格中，如此即可從縱橫交錯中顯示各字之音讀及其聲韻系統。

等韻圖之產生約在唐代中葉，今傳最早之等韻圖為南宋紹興年間張麟之刊行之《韻鏡》及鄭樵《通志》中之《七音略》，其底本均出自唐人。早期韻圖以韻書之音讀為據，故可作為擬構《切韻》音之主要材料。

宋元間，為適合實際語音之趨於簡化，且通韻併韻之風氣日盛，因而等韻表亦改變其面目，由原有之四十三轉併為十六攝。其中以《四聲等子》為最早。另有偽託司馬光作之《切韻指掌圖》、元劉鑑之《經史正音均韻指南》。

為研究之便，古音可大致分為三期：

- (一) 上古音 (Archaic Chinese)：包括周秦兩漢。研究材料除形聲字及古韻語外，漢藏語族之比較研究已漸受注意，由共同母語之推求，當可考知更早於文字資料之古漢語。
- (二) 中古音 (Ancient Chinese)：包括六朝、隋唐及宋代之古音。此期之語音資料極完整，現代方言亦與之關係密切，故此朝之音韻系統已大致可述。唐代語音已有顯著之轉變而異於六朝，至宋代更成為中古音步入現代期之橋梁。
- (三) 官話期 (Mandarin)：自元、明、清至現代。早期官話 (pre-mandarin) 以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韻》為最重要。此外尚有明初官修之《洪武正韻》、明蘭茂《韻略易通》、明末畢拱辰《韻略匯通》、清初樊騰鳳《五方元音》等材料，其間，官話逐步演化之痕迹均歷歷可見。

《四聲等子》屬北宋之音韻圖表，其音韻系統既有異於切韻音，復與官話音不同，實為上承切韻音，下開官話音，承先啓後之樞紐。由此材料可考見中古韻母發生如何之省併，早期官話之系統如何逐漸形成。故《四聲等子》之研究自有其重要性在焉。

第二節 《四聲等子》之時代與作者

《等子》未署作者之名，錢曾《敏求記》云：

古《四聲等子》一卷，即劉士明《切韻指南》，曾一經翻刻，冠以元人熊澤民序而易其名。相傳《等子》造于觀音，故鄭夾漈云：「《切韻》之興，起自西域。」今僧徒尚有習之者，而學士大人論及反切，便瞪目無語，相視以為絕學矣。

劉鑑切韻指南受《四聲等子》之影響確有其事，而謂之同爲一書則非也。《四庫提要》云：

今以二書校之，若辨音和、類隔、廣通、侷狹、內外轉攝、振救、正音憑切、寄韻憑切、喻下憑切、日寄憑切、及雙聲、疊韻之例，雖全具於《指南·門法玉鑰匙》內，然詞義詳略，顯晦不侔。至內攝之通止過果宕曾流深，外攝之江蟹臻山效假梗咸十六攝圖，雖亦與《指南》同，然此書曾攝做內八，而《指南》作內六；流攝此書作內六，而《指南》作內七；深攝此書作內七，《指南》作內八；皆小有不同。至於江攝外一，附宕攝內五下；梗攝外七，附曾攝內六下；與《指南》之各自爲圖，則爲例迥殊。雖《指南》假攝外六，附果攝內四之下，亦閒併二攝；然假攝統歌麻二韻，歌麻本通，故假得附果。若此書之以江附宕，則不知江諧東、冬，不通陽、唐；以梗附曾，則又誤通庚蒸爲一韻；似不出於一手矣。……《切韻指南》卷首有後至元丙子熊澤民序稱：古有《四聲等子》，爲流傳之正宗；然中間分析，尚有未明；關西劉士明著書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則劉鑑之《指南》十六攝圖，乃因此書而革其宕攝附江，曾攝附梗之誤，此書實非鑑作也。

《四庫提要》本段文字辨二書之關係甚明，然未明音變而以宕攝附江，曾攝附梗爲誤，實謬以六朝音繩宋代音也。

錢曾又謂《等子》造于觀音，觀音爲佛門菩薩，焉能有制作等韻圖之事？然自錢曾後半段文觀之，《四聲等子》當與佛徒有密切關係，或爲解釋佛經字音而作。

又《四聲等子·序》云：

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于《大藏經》函帙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唇齒之不分，既類隔假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以附《龍龕》之後，今舉眸識體，無擬議之惑，下口知音，有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

即云以《龍龕手鑑》重校，《等子》之出世並不早於《龍龕》。案《龍龕手鑑》爲遼僧行均字廣濟所作，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爲之序，時當統和十五年丁酉

七月一日，及北宋至道三年，西元 997 年。是《等子》之出世，最早不過此時。

《龍龕手鑑》為解釋佛經字音之字典，共四卷，以平上去入為次，各卷中分部首編排各字。其序云：

矧以新音，編於龍龕，猶手持於鸞鏡，形容斯鑒，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

又云：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窮者矣。

今所見之《龍龕手鑑》並無此《五音圖式》，如此《五音圖式》與《廣韻》後所附之「辯十四聲例法」、「辯四聲輕清重濁法」相同，為一簡單之圖表，必不致為後人所削去，故其圖當與《四聲等子》相同，係可以獨立成書者，吾人復以《等子》序中所謂「以《龍龕手鑑》重校」、「附《龍龕》之後」相驗證之，直可令人相信，《五音圖式》與《四聲等子》即為一物。智光明言《五音圖式》為其所撰，則《四聲等子》之作者即智光歟？

《四聲等子·序》又云：「《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設，肇自智公。」《切韻》之作於陸法言，為人所共知，而「關鍵之設」者，隱然有將《龍龕手鑑》所收字音作成扼要易覽之圖表之意。故稱之為「關鍵」也。而「智公」者，亦即為《龍龕》作序並撰《五音圖式》之智光也。由此，吾人可推斷《四聲等子》之著作時代必離《龍龕》初刊之時不遠，亦即當北宋初年，其出世地點當為北方之遼境，其著作之動機在於將《龍龕手鑑》之字音歸納為圖表，以便於閱讀佛經時檢覽字音。

日人大矢透氏以《等子》序中有「其指玄之論」一語，遂認為《等子》作於南宋。蓋王宗道有《切韻指玄論》一書，據《萬姓統譜》、鄭樵《七音略》、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其書其人均屬南宋。然細讀《等子》序文，「其指玄之論」一語似非指書名而言，所指當為序中所言「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畫為四類，審四聲開闔，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濁，以明其虛實。」之措施。且劉鑑《切韻指南·熊澤民序》云：「古有《四聲等子》為流傳之正宗。」可知《四聲等子》之時代必去《切韻指南》之元代甚為久遠，如《等子》作於南宋，安得稱之「古」耶？

《夢溪筆談》記《龍龕手鏡》云：

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博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

熙寧爲宋神宗年號（西元 1068~1077 年），時當北宋中葉，《四聲等子》之自遼流入宋，或因附於《龍龕手鏡》之故。由此，吾人可做一合理之推測：《四聲等子》一書作於北宋初，原附於《龍龕》之後，稱爲《五音圖式》，至北宋中，流入宋朝，宋人將其由《龍龕》析出獨立成書，並加以整理改訂，名爲《四聲等子》。

由《五音圖式》而變爲《四聲等子》，曾經宋人之改訂，可自以下事實得知：

其一，《等子》有十六攝之攝名，如開合不計，實際僅有十三攝，其中「江」併於「宕」，「梗」附於「曾」，「假」合於「果」。既屬同一圖，何需有二攝之名耶？故知其前身必爲攝攝分別，各專一名者，迨入宋人之手，複按實際語音之變化予以併合；亦即其主要元音江攝已由《切韻》之【ɔ】變爲【a】，故入於宕攝；梗攝已由【a】類元音變爲【ə】，故入於曾攝；至於果、假二攝之主要元音僅後【ɑ】與前【a】之異，故可併爲一攝也。所以有此差異，或爲北宋初至北宋中所產生之音變？或爲遼境與宋境方言有別，二者皆有可能也。

其二，《等子》之攝次與圖次不相應，此亦顯經後人改動之痕迹也。茲列表如下：

圖次	攝次	圖次	攝次
		[一]通攝	內一
[六]蟹攝	外二	[七]止攝	內二
[十一]梗攝	外二		
[八]臻攝	外三	[四]遇攝	內三
[九]山攝	外四	[十]果攝	內四
[二]效攝	外五	[三]宕攝	內五
[十]假攝	外六	[五]流攝	內六
		[十三]深攝	內七
[十一]梗攝	外八	[十一]曾攝	內八
[十二]咸攝	外八		

此表恢復原有之次序排列，上列屬外轉，由外一至外八；下列為內轉，由內一至內八。然外轉有二空檔，缺「外一」與「外七」。或即宋人更動原次時之漏誤。梗攝開口既標明為外八，合口又標外二，遂與「咸攝外八」、「蟹攝外二」衝突。梗攝或本為「外七」，正補於「假攝外六」與「咸攝外八」之間。驗之於韻書之次序，梗攝諸韻亦當見於「外七」之位置也。

又江攝漏注攝次，疑本為「江攝外一」，宋人更動時遺漏者也。如此則外轉之空缺全補足矣。

《等子》原攝次以「曾攝內八」之「蒸、登」諸韻置於末，與《韻鏡》正合，故知其原有之次序當承韻鏡而來，由此亦可知等子之前身受有早期韻圖之影響也。《等子》隨《龍龕》流入宋後，宋人覺其與宋朝流行之韻書次序不合，乃加以更動，可將曾攝前移，變為第十一攝，將收【-m】韻尾之咸攝與深攝移於最末，變為第十二攝與第十三攝也。

第三節 《四聲等子》之編排與內容

壹、編排概況

《四聲等子》四等之劃分略與早期韻圖不同，《韻鏡》乃先分聲調為四大格，每格復分為四等。《等子》則先分為四等，每等中復分聲調為平上去入。各字均依其等位、聲調及聲母填入圖中，如遇其音無字，則以空圈表示。各圖之首注明攝名、內外及攝次，並注明各攝之「輕、重」，輕重之下復注明各攝之「開、合」。各圖之後，分別於各等中注明所收字之韻目名稱。各圖末行則為各韻合併之說明，其目如下：

- 一、通攝內一：東、冬、鍾相助
- 二、效攝外五：蕭并入宵類
- 三、宕攝內五：江、陽借形
- 四、遇攝內三：魚、虞相助
- 五、流攝內六：幽併入尤韻
- 六、蟹攝外二：佳併入皆韻，祭、廢借用。
- 七、止攝內二：（無注）
- 八、臻攝外三：有助借用（未舉韻名），文、諄相助

九、山攝外四：刪併山，先併入仙韻，仙、元相助

十、果攝內四：(無注)

十一、曾攝內八：隣韻借用

十二、咸攝外八：四等全併一十六韻

十三、深攝內七：獨用孤單韻

所謂「借用」、「相助」、「併入」、「借形」並無不同之含意，皆指併轉為攝後，韻母簡化，使原屬不同韻之字音，混而無別，故特注於各圖之後也。

至於宕（江）攝、果（假）攝、曾（梗）攝三者之圖後又注有「內外混動」。此因宕攝原屬內轉，與外轉之江攝合併後，乃加注於後以明之。果攝原為內轉，而所併之假攝為外轉；曾攝原屬內轉，所併之梗攝則為外轉，故皆必注明於圖後也。

此外，早期韻圖以入聲承陽聲韻，《等子》則以入聲兼承陰陽，可知入聲之性質已發生變化，其細節俟下章詳論之。

《等子》聲母以三十六字母排列，而分為二十三行，其中「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孃」共佔四行；「幫、滂、並、明」與「非、敷、奉、微」共佔四行；「精、清、從、心、邪」與「照、穿、牀、審、禪」共佔五行。各聲母所出現之等位與編排狀況大致同《韻鏡》。所異者有三：

- 一、《韻鏡》聲母之次序為「唇音」、「舌音」、「牙音」、「齒音」、「喉音」、「舌齒音」，《等子》則以「唇音」與「牙音」易位，而以牙音置於首。
- 二、《韻鏡》聲母標目用清濁表之，《等子》則各列字母之名稱。
- 三、《韻鏡》之喉音次序為「影、曉、匣、喻」，《等子》卷首之「七音綱目」同之，而圖內則改為「曉、匣、影、喻」。

《等子》卷首另有一表，解釋聲母之排列，茲錄於下，並說明於後：

日 半齒音	來 屬半舌 具四等	喻 屬喉音 具四等	影 屬喉音 具四等	匣 屬喉音 具四等	曉 屬喉音 具四等	邪 兩一在四等一 兩二在四等四 禪 兩一在四等三 兩二在四等三	心 兩一在四等一 兩二在四等二	從 兩一在四等一 兩二在四等二	清 具兩等穿 具兩等穿	精 屬齒頭音 屬正齒音 屬正齒音	明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並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滂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幫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泥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屬重唇音	定 舌頭一在四等一 舌頭二在四等四 舌頭三在四等四 真二等 假二等	透 舌頭一在四等一 舌頭二在四等四 舌頭三在四等四 真二等 假二等	端 屬舌頭音 屬舌頭音 屬舌頭音	疑 屬牙音 屬牙音 屬牙音	羣 屬牙音 屬牙音 屬牙音	溪 屬牙音 屬牙音 屬牙音	見 屬牙音 屬牙音 屬牙音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此表以「角、徵、宮、商、羽、半徵、半商」表示「牙、舌、唇、齒、喉、半舌、半齒」諸音，本為附會之說，並無深義。其餘逐項說明於次：

(一) 牙音下注明「具四等」，其實群母本只有三等韻，《等子》始有少數群母字列入一、二、四等中，蓋音變使然也。所謂「四一」者，即四等中之第一等也。「四二」、「四三」、「四四」可類推。

(二) 舌音下「舌頭一在四等一」、「舌頭二在四等四」，其義為：舌頭音之一類在四等中之第一等，舌頭音之另一類在四等中之第四等。又有「真二等」、「假二等」之稱，所謂「真二等」者，指音和切而言；「假二等」者，指類隔切而言。謂舌頭、舌上音各具兩等，而兩等中又有音和與類隔也。

(三) 唇音下「四一」欄中「此中字屬唇音」應為「此中字屬重唇音」之誤，「四二」、「四三」、「四四」欄內此語皆有一「重」字。又有「七輕韻只居此第一等，有輕無重」之語，「七輕韻」不知何所指，廣韻各韻中唇音變輕唇者共十韻：「東、鍾、微、虞、文、元、陽、尤、凡、廢」，此「七」字或為「十」字之誤。又「居此第一等」之「一」字或為「三」之誤，蓋輕唇之發生僅見於三等韻之合口中，故云「有